

民国前期江南水利纷争与地方政治运作

——以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中心

陈 岭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作为地方社会运行的重要一环,水利事业不仅是公益关怀展示的空间,同时也是地方权势进行利益争夺的重要平台。民国前期太湖流域水利争论纷繁复杂,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无疑是各种争端中的焦点所在,对其成立背景及相关事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讨论在政权更替背景下的江南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水利事业参与地方政治。研究表明,民国前期江南地区极为复杂的水利纷争不仅体现了传统以来太湖流域的区域利益之争,更折射出在中枢政权未稳之时江南地方精英对权势格局的争夺。

【关键词】民国前期;江南;水利纷争;政治运作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087-14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 and Local Political Operation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during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CHEN 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society motion,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 public space of welfar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latform which power of the local minority groups to interest confli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hu Lake regions in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through analysis the hidden reason of water conservancy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setting and the widespread controversy of dredge Baimao river or Mao lake, lake fields reclamation, to discuss the local elites in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how to participate local politics as the background of regime change frequently.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lexity water conservancy controversy in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areas, not only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period regional interests dispute, but also refraction the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local elites dispute power pattern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stable.

Key words: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South of the Yangtse River; water conservancy dispute; political operation

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叙述模式中,水利与政治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早在 20 世纪初,西方

[收稿日期] 2017-06-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世江南的城乡环境、地域经济与政治变迁研究”(15JJDZON GHE005)

[作者简介] 陈岭(1983-),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2014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江南水利史。

学者魏特夫就曾提出“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①的理论,流布甚远。不过此论因缺乏具体的个案支撑,被萧公权斥之为“架空而经不起史料印证的无根之谈”^②,同时也不断遭到后续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受魏特夫影响,冀朝鼎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通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试图将治水事业与中国历代政治兴替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同时着重强调国家在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中的决定性作用^③。显然,冀氏的分析路数与魏特夫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都试图从水利事业出发寻求对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解释。此后,不管是反对抑或赞同,关于中国水利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基本围绕此二者展开。但实际上,当我们进一步将水利事业放置于国家与地方的视野——特别是具体的地方政治运作空间中——考察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地方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魏特夫与冀朝鼎的宏大叙事显然都难以回答此类细致而复杂的议题。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在摆脱魏特夫治水理论的影响之后,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的概念,影响深远^④。而国内学者在20世纪末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水利史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史转向”^⑤。由此,讨论水利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时下水利史研究所流行的新取向。但正如当前社会史研究在碎片化的质疑声中需要“重提政治史”^⑥的关怀一样,水利社会史的蓬勃发展,虽然揭示了许多极富新意的论题,但对于水利与政治之间的论述则不为多见^⑦。因此,细致讨论水利纠纷与政治运作之间的关系依然显得极为重要,并且这一讨论还必须从传统社会延伸至现代中国。

本文即尝试以民国前期太湖流域为中心^⑧,通过分析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以下简称“太湖水利局”)的成立背景以及引起广泛争论的浚渎问题、湖田浚垦问题,尝试讨论在政权更替及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江南地方精英如何通过水利事业参与地方政治,延续自身在地方中的主导性角色?地方社会

① [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② 黄俊杰:《万里寄踪常是客——萧公权教授访问记》,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1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第103页。

③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0页。

④ 关于这一理论的兴起及相关论争可参考[日]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史研究》,郑梁生译,台湾编译馆,1996年,第364页,“注释”。

⑤ 关于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可参考廖艳彬:《20年来国内明清水利社会史研究回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张爱华:《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的勃兴》,《史林》2008年第5期;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第6章“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323页。

⑥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 西方学者[美]彼得·C.珀杜、[法]魏丕信等人曾以洞庭湖、湖北江汉大堤为例对此类问题进行过讨论。如彼得·C.珀杜针对洞庭湖围垦问题研究后指出,“官方通常并不独自从事大规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们的合作。……至于何种类型的水利方案,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之间很少有人是东方专制主义垄断下的水利工程的被动牺牲品。虽然有国库拨出并由官方调整的用于水利工程方案的津贴有利于地方人民,但是却能触发自私的土地所有者与立足全局的官方之间的冲突。”魏丕信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即使考虑到国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也不是(水利)问题的惟一因素,不是惟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问题是多层面的,并非浑然一体,其所代表的观念和利益经常互相冲突。”参见[美]彼得·C.珀杜:《明清时期的洞庭湖水利》,《历史地理》1982年第4辑;[法]魏丕信:《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载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4页。

⑧ 关于民国前期太湖流域的水利史研究,冯贤亮曾对这一时期的“水利规划与地域社会”做过专门论述。冯贤亮、林涓:《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更为详细的考察见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303页。

又如何因应中央及地方政权的频繁更替？而在此纠纷中，个人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又是如何冲突与协调？事实上，这一时期极为复杂的水利纷争不仅体现了传统以来太湖流域的区域利益之争，更折射出在中枢政权未稳之时江南地方精英对权利格局的争夺。

一、太湖水利局的成立及其治水思路

对于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来说，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水利不治，农田之忧也，苏为财赋重地，京仓半仰给焉。旱潦不均，偏灾时有，讲水利以重农功，诚有司之急务矣。”^①所以，江南治水历来为执政者所首重，而围绕水利所呈现的各种利益纷争亦纷繁复杂。清人钱泳有云：“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赋，而人职其功。”又云：“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②可见，排水问题又为江南治水之首重。时至清末民初，江南水利现状如后世修志者所言，“水利失修，加之地形地貌等自然变化，洪水灾害加剧。当时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洪水没有专道宣泄，依靠湖泊、河网、洼地滞蓄后，缓慢迂回泄入江海；其次是太湖没有控制，通湖淞港，自由纳吐，湖河连成一片，高低不分，洪涝不分；再次是水系紊乱，有网无纲，大水年洪水倾泻，下游潮水顶托，内水排不出，洪水无法泄。”^③所以，水利疏浚在当时无疑是一项非常紧要的工作。

民国八年(1919)八月，江苏、浙江两省省长共同致电大总统、国务院暨全国水利局，转呈江浙士绅要求，请任命钱能训为督办，督修太湖水利。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总统特命派钱能训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而王清穆、陶葆廉为会办。不过，钱尚未正式到任即于次年八月托疾请辞，改“推”王清穆为督办，陶葆廉为会办^④。事实上，此时江苏省已经有专门负责水利疏浚的江南水利局，而浙江省也有浙江水利议事会负责浙省水利事宜，为何还需要再设立一个太湖水利局？关于这一事，金松岑在给庞树典所写的传中有更为隐秘的说法：

己未夏，君忽踵我门而言曰：“熊希龄、潘复设运河工程局于津，不曰直鲁者其函义包有苏浙然而不及苏浙者，力不逮也。张謇、韩国钧设江苏运河工程局于扬，不曰江北者，其函义包有江南，然而不及江南者，力不逮也。我岂能待人之有余力始疏治哉？吾欲缔构太湖水利工程局，钱能训，东海之心膺也，昨去总理职，吾欲请其为督办而崇明王清穆、嘉兴陶葆廉副之，吾子以为奚若？”余曰：“可哉？”君曰：“熊氏之治运，独裁制也。张氏、韩氏之治运，有江苏水利协会在，半独裁制也。吾欲试行代议制且公推督会办，毋使人曰：‘此群儿自相贵也。’”余因访浙西水利议事会于杭，复函江南二十五县，构成苏浙太湖水利委员会。委员会成，请愿设立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选余与宜与储南强为代表入都，而京官则推汪凤瀛、沈金鉴、钱锦孙，五人入见大总统徐世昌，阁议报可。钱氏故任阁揆，其规模阔远，既知苏浙不能供巨费，则荐崇明自代^⑤。

① 同治《苏州府志》卷9《水利·一》，光绪八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8页。

② [清]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卷4《水学》，中华书局，1979年，第87、88页。

③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④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1630号(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苏省省长公署令(太湖水利工程局咨行设立局所启用关防日期)》(第5015号)，《江苏省公报》1920年第2469期，第6-7页；《太湖水利工程新旧督办函牒》，《申报》1920年9月4日。

⑤ 金天羽著，周录祥校点：《天放楼诗文集·遗集》卷4《庞芝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8-1059页。

这段文字透露出太湖水利局设立背后所蕴含的重要信息既耐人寻味,也折射出民国初年地方政治的运作秘辛。太湖水利局的设立表面上看似是江浙士绅的一致要求,事实上却夹杂着庞树典个人的期盼,进而得到好友金松岑的支持与运作。庞树典为常熟人,庞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发展成常熟巨族,在江南地方事务中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其祖父庞钟璐在咸同年为朝中权臣,曾任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工部尚书等职。其父庞鸿文也是光绪二年进士,曾任太常少卿、通政司副使等职,而其叔父庞鸿书在清末曾任贵州巡抚、湖南巡抚等职。不过,这一官宦巨族随着清民鼎革而逐渐衰落^①。作为庞氏家族的长孙,庞树典无疑非常希望自己能重振家风,恢复往昔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此时庞树典实为江南水利局测量事务所负责人。江南水利局设立于民国三年(1914),专门负责江苏省水利疏浚事务。民国四年(1915),江南水利局成立测量事务所,庞树典与袁承曾为正副主任,组织三角、图根、水准、地形等共10班,测绘淞泖水利事宜^②。不过,测量事务所的测量事务展开得并不顺利,在江苏省议会上即遭到很多议员的质疑,既有江苏水利协会测量队,为何还要再设一个测量事务所,似有重叠之嫌。金松岑在会议上解围说“协会二字意味只能在赞助之列,不能有所作为。”^③

庞树典与金松岑为旧交,对于庞树典提出另外成立太湖水利局的提议金松岑亦深表赞同。实际上,二人至迟在宣统三年(1911)就相识,而且两人皆有志于水利。是时,金主张“淞流不入浦,复故道出宝山之吴淞镇以入海”^④,而庞则主张“拓浦之上游泖,泖有南北支,浚北以辅南,承上泄下,与浚浦局工程会。”其后,金松岑也承认“吴淞改道之议,因嘉定人之齟齬,且功费亦不貲,余改就君说。”^⑤所以,金松岑才充分发挥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在江南水利局之外,积极运作设立“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这一机构。“复函江南二十五县,构成苏浙太湖水利委员会”^⑥,进而与宜兴储南强入京,加上在京为官的苏州汪凤瀛、长兴沈金鉴、嘉兴钱锦孙,共五人入见大总统徐世昌,之后果然如其所请,设立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金松岑为吴江县同里镇人,与陈去病、柳亚子三人并称为“吴江三剑客”。早年曾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鼓吹革命,宣统三年迁居苏州。民国初年,曾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不过,不管在苏州还是吴江,民国初年的金松岑都很难说已经成为地方事务的主要领导者。但金松岑在江浙地区朋友广泛,影响力不弱,而与其一起入见总统的四位江浙士人亦都为地方巨绅。可见,民国前期因政权频繁更迭,水政机构的设立,地方士绅在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此分析,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的设立之主要目的实际上乃是为实现金、庞两人之治水理想,以及通过此机构的设置,进而提升二人在江南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就其二人治水理念而言,民国四年庞树典就在写给新上任的江苏省省长齐耀琳的呈文中进行过明确阐述。在庞树典看来,古人治水都有区域局限,以至于务北而忘南。治水需要有系统规划,不以流域为范围,“而以省界为限制,根本即已错

① 如庞树典的小女儿庞茗所说:“从外表看起来,庞家还是挺象样的。但整个大家庭在民国时候散掉了,这既同社会巨变有关,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丁少,没有人能支撑这个家了。”参孙萍著:《百年家族:庞薰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关于庞氏家族在清末民初的遭遇,还可参考庞薰琹的回忆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② 《县公署文告两通·测量水道》,《申报》1915年9月11日第12版。

③ 芝香:《苏省十三、四两日会议记》,《申报》1916年12月6日第6版。

④ 据常熟人徐兆玮的记载,民国元年九月十八日,苏浙水利联合会借吴县议事会为议场开会,金松岑在会上即主张吴淞改道,不以娄葑为亟,不过“辩论良久,卒不能伸其说”。可见金松岑的吴淞改道之说并未能得到江南士绅的赞同。参徐兆玮著,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民国元年九月十八日”条,第361页。

⑤ 金天羽著,周录祥标点:《天放楼诗文集·遗集》卷4《庞芝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8页。

⑥ 金天羽著,周录祥标点:《天放楼诗文集·遗集》卷4《庞芝符传》,第1058页。

误”^①。所以,他提出包括二十六条疏浚路线在内的全盘计划,其第一条即为,“起黄浦西大泖港,溯斜塘,贯澱山湖、急水港、同里湖等处,至瓜泾口止。”^②这篇呈文经过袁承曾的删改发表在民国七年(1918)《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一期上,而在同一期杂志上,金松岑也发表《江南水道述》一文,二人遥相呼应^③。在金松岑看来,目前太湖排水只有“掣淤入娄”与“废淤存浦”两种说法,而白茆河则万万不能开,“开之则宜封塘,以免浑潮之侵入”,“不封塘则清弱浑强,不数年而其功将废矣”。所以,浚茆是“舍正而用奇”,而掣淤入娄之说也不可行,那么就只剩下唯一的路径就是废淤存浦,方法即大浚泖河^④。

同时,作为江苏省议员,金松岑还向议会提出《省议会筹兴江南水利应从测量入手案》,认为凡治水必须要有系统规划,而规划基于测量。

吴苏亦固有水利局之设矣,然二三年来,绝未闻有统系之研究与办法;亦曾有淤泖测量事务所之设矣,然测线所及,仅为官厅指定最短距离之一部,而未有全盘之规划。再言成绩,白茆、刘河先后开浚,近且有开浚吴淞江尾间蕴藻浜一段之议。闻其所以开浚之故,曰:去淤而已,利交通而已,进一步言,则泄太湖之水使长趋入海,以消上游之涨,祛中满之患而已。问太湖水量,究有几何,是否仅恃此三口足以资宣泄耶,抑或倾斜之数,适当其度,仅将此三口尾间一开便永不复淤耶^⑤。

显然,这里说的水利局即为设立于民国四年的江南水利局,从上面也可以看出金松岑对于此局浚治太湖水利效果的不满。有意思的是,江南水利局的淤泖测量事务所恰恰是庞树典负责的,而在金看来,测量所的测量成绩一无是处。这也可以推测出庞树典为何既在江南水利局负责测量事务,又还要与金松岑另外成立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的原因。显然庞树典对于江南水利局也有所不满,所以才有此想。而对于前人浚治太湖的态度,两人则相当一致^⑥。

结合前面所论庞树典给江苏省省长齐耀琳的呈文可以看出,金松岑和庞树典都一致认为古人对于浚治太湖毫无系统,并且本末倒置,所以才会屡浚屡淤,以致巨万之金钱付诸东流。在这一思路之下,他们对重新测量太湖水利做了系统安排。在新的规划中,测线范围分四大部分:(甲)江南之运河;(乙)太湖形势;(丙)青浦以西,震泽以东,秀水以北,元和以南九千余里之湖荡;(丁)阳城湖亦为江南滞水过水最大区域之一。此后这一议案不仅通过了江苏水利协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还直接以江苏水利协会的名义呈请省长批复。不过这一议案在当时就遭到了同为吴江人的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委员费承禄的质疑。在费氏看来,金的议案“好大喜功,泥古而不通今”,甚至爆料“借洋债数百万,借公利己。”^⑦对于这一指摘,金松岑当然予以否认,并逐条辩驳。对于“借洋债数百万,借公利己”的指摘则更说“吾人立言当负责任,不能信口雌黄”。同时,金松岑还再次说明“夫治三吴水利,而首施工于白茆,吾

① 事实上,其推举的太湖水利局督办王清穆似乎并不赞成其说,其日记中记载:“庞君芝符言耿橘论水利,眼光不出乎常熟,然观其用湖不用江一语,虽仅为常熟计,实则太湖流域数十县,皆适用橘之说也。芝符又言郑亶论水利,眼光不出乎昆山,然观其治田之法,高田则开沟以蓄水,低田则筑堤以防,昆山固应如是,实则太湖流域数十县,亦皆适用亶之说也。”见王清穆:《农隐庐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初九日”条,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 庞树典、袁承曾:《江南水利计划书说略》,《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期(1918年)。

③ 金天翻:《江南水道述》,《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期(1918年)。

④ 金天翻:《江南水道述》,《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期(1918年)。

⑤ 金天翻:《省议会筹兴江南水利应从测量入手案》,《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期(1918年),收入氏著:《鹤舫中年政论》,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⑥ 金天翻:《省议会筹兴江南水利应从测量入手案》,《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期(1918年),收入氏著:《鹤舫中年政论》,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⑦ 费承禄:《会员费承禄上会长江南水利书》,《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2期(1918年)。

曾反对之,其工程吾尤其反对之!何也?以白茆至来源不远,其所泄不过无锡、江阴小部分之水,而况乎其未必能泄也。”^①可以看出,金松岑为实现其与庞树典所主张的浚渎之说不遗余力,所以钱能训才说“自公等倡议推举主任以来,凡设机关、明权限、定区域、编预算、筹经费、靡不殚心竭虑,苦费经营。而我公毅力热心,不避劳怨,尤为全部主干。”^②

在经过前期的各种准备之后,民国九年(1920)十月,“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在苏州铁瓶庵正式成立。王清穆任督办,金松岑任总务科长。实际上如吴江人费承祿所说,“丹老阴柔寡断,全被松岑钳制,绝无自动能力。”^③而我们在王清穆的日记中也经常看到,在太湖水利局的人事与经费预算上,王清穆经常要与其商量,也可见金氏在局中权势之大。太湖水利局成立后,即着手制订了充分反映金、庞治水思路的《太湖上下游水利工程预拟计划大纲》。胡雨人曾对此计划大纲做过准确概括,认为民国之初江南水利工程概括起来分作三个时期:“计划大纲各时期之事业,第一期曰浚渎、浚濠、测湖、测苔;第二期曰浚湖及续行浚濠;第三期曰遍行平面测量及再续浚濠。统计分期三,分年六。约言之,为浚渎、浚濠、浚湖、遍行平面测量四大端,其余工程皆六年以后事也。”^④可见,此计划与前面论及金、庞的浚渎思路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太湖水利工程局也致函江浙水利联合会征求意见,并指出此计划乃是“浚渎测湖,标本兼治”^⑤的全盘规划。

二、浚渎还是浚茆:漩涡中的太湖水利局

江浙水利联合会是由江苏水利协会、浙西水利议事会发起的联合组织,民国八年三月份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规划江浙两省互有关系的水利事宜。联合会地点设在上海,同时于南京江苏水利协会、苏州江南测量事务所、杭州浙西水利议事会各设一通讯处。主要发起人包括黄以霖、陈伯盟、沈惟贤、庞树典、袁承曾、郑立三、金天翻、储南强、季通等人^⑥。

接到太湖水利工程局的函文,江浙水利联合委员会召集部分民间水利事业领袖及地方士绅代表组成审查员,针对这一计划开展实地勘察。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的结果与计划大纲中的诸多数据差别甚大,有的甚至和调查结果南辕北辙。无锡水利专家胡雨人主持将调查意见汇总,经审查会核实通过后刊印,即《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在此调查报告中,审查会提出“浚渎不可行”、“浚濠宜择要即行”、“测湖宜缓行”、“测苔宜即行”、“浚湖大计决不可行”、“平面测量当然次第遍行”等多项建议。特别是在关于浚渎、浚湖的核心问题上,胡雨人在报告书中尖锐地指出:“渎湖一带殊无病象,不必浚、不能浚、不宜浚也。”^⑦至于浚湖大计,则认为是“此计划大纲

① 金天翻:《江南水利之商榷(告费君承祿)》,《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3期(1918年)。

② 《太湖水利工程新旧督办函牍》,《申报》1920年9月4日第10版。

③ 《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十九日”条,第2244页。

④ 《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⑤ 《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预拟计划大纲咨询江浙水利联合会书》,《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

⑥ 《江浙水利联合会发起》,《申报》1918年12月30日第7版;《江浙水利联合会成立》,《申报》1919年3月17日第10版。

⑦ 《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根本错误之所在”，浚湖的办法虽然在计划书中没有明言，但金松岑曾明确指出：

江南之水症结所在，下游则泖，上游则东太湖。泖底之高过淀山湖底一丈，东太湖底亦高出西太湖底一丈，理宜于东太湖中开浚双洪，一引吴兴之水，一引宜兴之水，使得顺轨以出吴江之平望，东向淀湖，淀湖中又浚一洪，使向拦路港，以出泖而达黄浦^①。

这就是被称为治湖之根本计划。但事实上，经过测量，泖底高过淀山湖底一丈之说，在胡雨人看来纯属无稽之谈，“泖底非但不高，实低于淀底平均四尺许。”^②这两条实为否定浚泖浚湖计划最根本之依据。同时胡雨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计划，共计四十三条，并将“大浚白茆河，续行裁湾取直，起支塘下游之徐家浜，上至白茆新市”作为最为紧要之事。而且在经费上，虽然“未经工程测量，无从估计，然浚泖湖之异常大工，既不可行，以之分治各河，当不至超出原计划预算之上。”^③虽然其计划中的各项措施，存在很多争议，但对于指出浚泖浚湖计划之不可行则有理有据，言之凿凿。

既然胡雨人提出新计划中最为重要之事为大浚白茆，甚至希望刷成第二黄浦，这自然需要得到常熟士绅的支持。为了给太湖水利局施加压力，同时也希望能联合更多江浙士绅站到自己一方，所以，胡雨人主动联系上了常熟士绅丁祖荫等人。在这封公开信中，胡雨人明确表态，“弟对于太湖下游计画审查报告，决计主张停止淀泖开浚，而移其大工东北，大浚白茆，冀作第二黄浦。”^④胡雨人的设想让常熟士绅既喜又惊，如能借此机会疏浚白茆南段，自然欣喜，但是其言要“大浚白茆，割湾取直，使潮水直达鲇鱼口”^⑤则让人惊讶。如此大的动作，其利害关系连徐兆玮等人也未敢遽下结论。所以，虽然常熟士绅内部信件往来，频繁讨论，但并未给胡雨人直接答复^⑥。

作为太湖水利局督办的王清穆，在审读过胡雨人所撰写的调查报告书之后，认为仅有丙部测量数据还不足以成为取消浚泖浚湖计划之依据，可能等所有测量结果出来后，或许依然是泖底高过淀山湖底也未必可知。同时，针对新计划中的种种疑惑也逐条进行了辩难。关于白茆河一节，王清穆担心有“坍没两岸熟田”之虞，甚至可能出现“安知非淤成平陆之征兆”。而且担心如果按新计划使白茆河成为第二黄浦，恐怕“清水分散力弱，而两大干河皆易受淤，不然清水或偏注一路，则此通彼塞”。所以，为今之计，只能“在徐家浜以上相地建闸，闸成而后河可浚。”^⑦从王清穆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发现，实际上他回应胡雨人的很多观点基本都与庞树典与金松岑的治水思想保持高度一致，这也体现了太湖水利局在此事件上对外的一致态度^⑧。

①《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②《复王督办》，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③《复王督办》，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三月二十日”条，第2214页。

⑤《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条，第2216页。

⑥关于常熟士绅在清末至民国疏浚白茆河的相关研究，见拙文：《清末至民国江南水利转型与政治因应——以常熟白茆河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⑦《王督办与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诸君论黄浦白茆计划书》，《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附三。

⑧如“坍没两岸熟田”、“安知非淤成平陆之征兆”、“开门揖盗”、“认贼为子”等语皆出庞树典给其写的信函，同时日记中也有“局中同事对于胡之论水利竟可各抒己见，惟不再有自相抵触”之语。见王清穆：《农隐庐日记》，“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八”条、“民国十年五月二十二”条。

与此同时,作为浚渎之说的主要发起人,同时也是江南水利局测量所主任兼太湖水利局秘书的庞树典也对胡雨人的质疑做出了回应。不过相对于王清穆的闸坝之争,庞树典的回应则更乏力,甚至在他的《致审查会书》中直言:“所谓害者,不过糜金钱四五十万而止,尚不及一年一师团之饷也,且现正欲研求浚渎上游,使有鬯宣速泄之方法,初不谓一开而即为成功也。”^①但胡雨人却并不这样认为:

浚渎之害,决非仅糜金钱四五十万而止也。以渎底如此坚硬,工程之无可预算,观两年来江南水利局施工之难,则以后之糜金无尽可知,然果但在多糜金钱,虽至五倍十倍,其害仍为有限,吾辈听其糜之,犹可说也,所最患者,其杀人之祸。^②

同时,虽然庞树典解释说,浚渎浚湖计划是他与袁承曾发起的,希望胡雨人不要责怪金松岑一个人。但胡雨人在《敬告同会诸君子》的公开信中依然将矛头直指金松岑,并且言辞极为激进。事实上,如前所述,浚渎之说确实先发于庞树典与袁承曾之议。但为什么胡雨人将矛头直指金松岑,我们不得而知,但王清穆的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些许线索。“周仲分来谈,对于松岑恶感甚深,谓松岑屡次会晤,盛气难亲,且有不堪入耳之言,……松岑才气太露,往往于文字间得罪朋友,属余劝其收敛,洵君子爱人之道也。”^③可以看出,金松岑在为人方面盛气凌人,经常得罪人,或许与此也有关。

实际上,庞树典及金松岑与常熟士绅之间的矛盾早在在民国元年(1912)疏浚白茆河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彼时,以丁祖荫、徐兆玮为首的常熟士绅主张大浚白茆,而庞树典则主张仿照道光二十九年,就最淤塞处用新式挖泥机器,使低区积水速退,得及时播种菜麦的急浚之法。虽然其后来囿于各种压力也说急浚不如大浚,但因其素来主张“王、陶之说”^④,所以民国三年二月十七日张叔颖在给徐兆玮的信中就说:“河工事为松岑、芝符二人几破坏大局,幸唯公来嘱速与徐司长详述一番,庶可云开日出。”^⑤可见其矛盾由来已久。

既然胡雨人矛头直指金松岑,金也作《胡君雨人报告之驳论》一文作为回应。认为“白茆开,则使常熟一县全为潮河。”甚至,“将使昆城、尚湖、嘉菱、鹅真诸荡尽数淤为棉田,而阳城、巴城诸河又必告淤,七浦之来源绝矣。”^⑥这一认识,被胡雨人讥讽为“头不进潮,而尾间之潮反可上灌太湖,彼金君者,岂以肛门饮食,以口腔便溺者耶?抑欺我太湖流域之父老昆弟尽为聋瞽,而不辨菽麦者耶?荒谬绝伦,到此地步,何堪再与辩论。”^⑦至此,争论双方各执一端,而态度又极为激进。所以,庞树典说双方都已经到了“专斗意气,不管事实”的地步,“除文字对打之外,两方面无他长技矣”^⑧。而对于金氏此论,常熟士绅也异常愤怒,更无异于火上浇油。

作为民间士绅代表的胡雨人虽然在道理上占优,但是事实上,仅凭单枪匹马的男儿血性还是很难与庞大的太湖水利工程局对抗。他与局中的主要人物王清穆、金松岑、庞树典等来回辩论也都无法说服对方。在金松岑的把持之下,太湖水利局试图将治茆的调查报告完全推翻。六月初一日,江浙水利联合会开会议讨论浚渎工费问题,“诤意该局秘书兼任总务工程各科长之金天翮竟率其兼充局员之会员

①《庞芝符君致审查会书》,载《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10期(1921年)。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附四。

②《敬告同会诸君子》,《江苏水利协会杂志》,第4期(1918)。收入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

③王清穆:《农隐庐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三十日”条,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徐兆玮日记》,“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条,第1214页。

⑤《徐兆玮日记》,“民国三年二月二十三”条,第1452页。

⑥《徐兆玮日记》,“民国三年二月二十三”条,第1452页。

⑦《金天翮君报告驳论正谬》,收于胡雨人编:《治湖箴言》(民国铅印本)。

⑧《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条,第2247页。

暨该局之雇员徒侣混充会员列席与议,始则由审查员之兼局员者,始则以调查尚未详悉,强令重付审查,继将过半数正式签字之报告书擅自涂抹,以致无从付议。乘沈副会长惟贤假期内,由曹元朗却还原案,置不付印,而此案既无结果,而该局浚渎之計畫益复盲进不已,金松岑并于审查会中昌言,联合会无论如何主张,不能稍变其治渎之成见。”^①金松岑试图用行政权力强行把浚茆计划打压下去而继续实施其浚渎浚湖计划。在此危机时刻,胡雨人紧急联系江浙士绅数十人,试图呈文两省省长及登报宣言,以期对抗强权^②。而在此过程中,常熟士绅的态度则极为关键。

《徐兆玮日记》中保留了胡雨人送来的江南浙西公民对于太湖水利工程局之宣言草稿,矛头则直指太湖水利局运行中存在的各项问题,是为釜底抽薪之计^③。事实上,对于江苏省政府来说,因政局不稳,财政紧张,刚好可以顺水推舟。而对于太湖局来说则无异于灭顶之灾。至此,双方争执也从浚渎还是浚茆这一问题转移到了太湖局改组与存废之上,而常熟士绅则置于漩涡之中心。此后,胡雨人与常熟士绅的联系更为紧密,信件往来非常频繁^④。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出,胡雨人及常熟士绅在行动上已近完全一致,并且利用私人关系发动三河流域之绅士一起来对抗太湖水利局。

在此之下,常熟士绅的态度也令太湖水利局的人甚为紧张。事实上,金松岑等人也在悄悄的改变说法,试图缓解与常熟士绅之间的紧张关系。金松岑在给邵松年、丁祖荫、徐兆玮的信中说,太湖局规画两省水利,以有利于地方,无害于将来为前提。“白茆之当治殆无疑义”,只是此次沿江各县之灾实由“江水倒灌”而成,而白茆之所以易涨易泄,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在江口设闸,而且不能因为历史上的闸坝无不失败就直接否定闸坝的功能,其实历史上的闸和今日之闸已经完全不同。“闸坝之用实足以操纵江河,此语中外所共认,未可以简单之一语否决之”。虽然丁祖荫在转给徐兆玮的时候说“此函尚带有疏通语气”,但是“诡计必预防。”^⑤此时,金松岑已经完全改变前说,而是认为“白茆之当治殆无疑义”,只是设闸问题上还可以再讨论。与此同时,金松岑还向王清穆提交了辞呈,不过王清穆并未批准。在他看来,自古任事之人最易招骂、诽谤,这很正常。而且现在太湖局中各种事情非常棘手,万分为难,尽无安乐可享,只能共患难^⑥。

此后,庞树典与王清穆也先后致信丁祖荫、邵松年等常熟士绅。其中,庞树典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庞树典本是常熟人,并且是常熟巨绅庞鸿文的长子,却被东乡人说为“貽害乡梓”。其在回复丁祖荫的信中说自己本来就“主调停”,胡雨人刊印的两封信,言语极为和平也可为证。督办王清穆近日不仅身体欠佳,而且“心亦甚灰”,金松岑则“精神强固,虽陈炯明、李烈钧不过如此”。不过关于这一争论,太湖局中目前“余人均不愿干与此事,总之除文字对打之外,两方面无他长技矣。”所以,他主张是否可以“今年先行捞浅,再议裁湾”,并且特别说明“不曰不裁而曰再议,两方兼顾,事实易行”。认为现在金松岑与胡雨人双方都已经到了“专斗意气,不管事实”的地步,意气既盛,争讼益多,此事自然也不会有好结局。况且“以事实论,局中浚渎,五十万分文无着,即移为浚茆,又岂即有金钱?姑行捞浅,以保十年,再图后举,亦是一策”。如果“先行捞浅,再议裁湾”这一策略可行,省咨议厅长罗毅卿与财政厅长严家炽均愿意做调停人。同时,庞还透露,“雨人不过李逵之流,背后之宋江、吴用、花荣、燕青甚多。”^⑦庞氏指出胡雨人背后的这些人,虽然未能明言,但却隐约指出此次争论不仅是理念之争,其背后还有利益

①《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初四日”条,第2238页。

②《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初二日”条,第2237页。

③《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初四日”条,第2237-2238页。

④《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十六日”条,第2242页。

⑤《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十六日”条,第2242页。

⑥王清穆:《农隐庐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条,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⑦《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条,第2247页。

群体的较量。

事实上,对于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位置,常熟士绅完全有自己的看法。张鸿就说我们不能“以息老之步趋为步趋”,而应该主动出击,呈稿至省。不过也说呈不呈文其实“亦无甚关系,缘省中实业财政与总务厅长已会稟铁老,只须公呈一至,即可停发,无甚阻力”。结合常熟士绅内部讨论的信件往来可以看出,常熟人已经决定最终目的不仅在于疏浚白茆南段,更要推翻整个太湖水利局。果然,鉴于常熟士绅的强烈态度,金松岑将常熟人陈慰慈招至苏州,试图让陈去进行调停,缓和与常熟士绅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七月初九,陈慰慈致信丁祖荫说:

我常同人对于该局主张争持驳难,实仅仅茆河浚否问题,并非于该局具体计画总施攻击。现在浚茆工程已经认为重要,抗议目的可云贯澈。……我常同人仗义执言,已获胜利,似宜适可而止,不必再有举动,致伤感情。^①

虽然陈慰慈与徐兆玮、丁祖荫等人也是朋友之交,但在徐兆玮看来,“陈慰慈欲作调人,自不量力。金既认白茆为必要工程,不啻自行取消具体计画。白茆、唐市间设闸,有何用处,岂仍欲践其先筑闸而后开浚之宣言耶?愚意法律有毁损名誉赔偿之规定,今太湖局对于白茆塘一则曰古人认为不泄湖水,再则曰是否有干河之资格,其侮辱我白茆也甚矣,非做到回复名誉时,决不能就此中止。”^②

三、利益纠葛中的地方与政治:太湖水利局的命运

民国十年(1921)八月中旬开始,江浙普降暴雨。九月初一日,瞿良士在给徐兆玮的信中说:“邑中大水为灾,我乡尤甚,虽经朱公召集城中父老设局筹赈,惟恐有缓不济急之势。且灾区广大,哀鸿遍野,来日方长,后难为继,殊深虑之。”^③同时,胡雨人也在在此期间到处考察水患,“自太阴历八月十四日淫潦普遍以后,全湖流域,至今久晴,而潦水之退,迟之又迟,为从来所未见”。据此,写成三万余字的《关于民国十年水灾后调查报告》,胡雨人的调查再次证明了下游分泄的重要性,同时也进一步考察了浚淤的荒谬。根据他的调查,在大雨一个月后的九月十四日,他到松江看到潮涨潮落往复自由,询问当地百姓,说:“吾松水流,自泖湖以下,恢复常水位原状已久,早无潦水迹象可寻”,这令他感到很是惊异,因为太湖周围附近数十里中,不论上中下游,退水均未过盈尺,为何单单泖河以下退水如此迅速?一个月后,他至泖湖考察才发现,“以丈八竹竿测其底深,虽西北角几微之最浅处,尚深至九尺五寸以上。”连测西泖全身,自首至尾,三小时中无瞬息之停,通计十二尺以上者三之一,十五尺至十七尺者三之一,十七尺以上一竿不得到底者三之一。合东西两泖,其宽自百丈以内,至二百丈以外。以如此宽深、如此畅流之水道,而竟烦太湖局浚之,谓不知其真相欤!^④

至此,胡雨人认定,无论“袁科长所任之测量,金科长别派之测量,全无信用”。如此瞎测,只能徒耗民脂民膏。胡雨人建议,今后测量,“不问水陆,须改去食客制,俟总工程师信托得人,然后议之”。要之,所谓浚淤在胡雨人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至于测湖,也最好是等以后平面测量结束后量力而行。目前最为紧要之事,应该疏浚白茆河,引北半湖之水,由沙墩港下行以归江。同时,疏浚顾冈泾、蕴藻浜,使吴淞江水分流入海。至于黄浦一途,只需在有淤塞之处,择优酌浚即可。在这份水灾调查报告中,胡雨人不仅指出太湖局测量之谬,还将浚淤浚湖的计划归之为“金科长之阴谋”,将矛头直指太湖局:

①《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七月十六日”条,第2256页。

②《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七月十七日”条,第2256页。

③《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九月初三日”条,第2269页。

④胡雨人:《关于民国十年水灾后调查报告》,《江苏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收入陆阳、胡杰主编:《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第192-219页。

今日之太湖局,不但不为正当之工程,而反大妨害于固有之工程。即如彼所自称为最要之浚渎工程,往日江南水利局以一机船挖之,所挖虽少,尚有少许之泥可见也。至今年四月,工费二万元为太湖局用去,而渎工废矣,浚渎之机船不知为何事矣。吴淞江工程正当进行,彼强取其在工之大机船一座,自五月至今,搁置在虹口之某船坞矣。同时向溧阳借一机船,至今锈蚀于叉袋角矣。问何以故?曰“无钱也”。而贿赂公行,则反有钱甚多。嗟嗟!此太湖局非他,我江南、浙西人民,以历年岁旱侵寻,救死扶伤,而为此两省组合之自治体也。孰不知为纯粹之公益事业,无端造此偌大衙门,岁耗我民脂民膏至七八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况其行为荒谬恶劣一至此耶。此而不问,试问我江南、浙西是否尚有人在?!^①

如胡雨人所说,太湖水利局确实问题丛棘,人事浮肿。从人事上来说,太湖局配有督办以下共 136 名,每年仅仅工程局费用就达七万余元^②。难怪胡雨人疾呼“无端造此偌大衙门,岁耗我民脂民膏至七八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这一点,金松岑也并不否认:

崇明有清誉,然闇弱不能周务,而水利委员会中人无论苏若浙,皆自以为有翊赞功,争请入为曹掾,或就咨询职,攫干俸,不得则大诟。崇明窘,余左右之,相机迎拒,以是颇遭怨谤。^③

是年十二月,江浙水利联合会以嘉兴金蓉镜的名义爆料,“太湖局拟向财、内两部接洽各项文据,第三项涨滩私垦田地准予缴价承领,第四项援照浙江塘工办法,发行奖券。且谓见宗受于致金松岑密函,允三七分肥,与江苏官产处运动”^④。而张鸿在给徐兆玮的信中更直言,“太湖局宗旨不过想得湖田,与沙棍无异,若能根本解决,亦一快事也。”^⑤说明太湖局之湖田放垦计划,在江浙士绅的口耳传闻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次年(1922)元月,在太湖水利局经费艰窘、舆论压力强大的情况之下,督办王清穆被迫向总统提出辞呈,不过未能准允^⑥。三月,太湖水利局以“本局经费支绌,实行减政”^⑦为由进行改组。不过此次改组效果并不好,如该局会办陶葆廉所说,“改组以后,局用反增,旧时属员既换汤而不换药,添委新员更源源而不绝。倘使秉政者采纳忠告,任贤使能,犹可折服群众而息浮言。无如所亲信者多属同乡,学无根柢之流,且皆予以重要位置,于是逐臭之夫如蚁趋膻,奔走其门。”^⑧显然,此次改组只是在经费紧缺的压力下,为调和各方利益而进行的,不仅未能实现裁员节流的目的,人事问题还越改越浮肿,并在太湖局内部也引起争论。此外,此次改组还对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总务科长金天翮调任秘书,遗缺委张大钧补充”,“测量科长袁承曾调任秘书”,“又委任前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华毓鹏为总工程师,徐岳生为副工程师兼测务主任”^⑨,至九月份,会办陶葆廉也辞职,任命彭谷孙与莫永贞

① 胡雨人:《关于民国十年水灾后调查报告》,《江苏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收入陆阳、胡杰主编:《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第192-219页。

② 江浙水利联合会编:《江浙水利联合会审查员对于太湖局水利工程计划大纲实地调查报告书函并附件》,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附“太湖局九年度预算表摘要”。

③ 金天羽著,周录祥校点:《天放楼诗文集·遗集》卷4《庞芝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8-1059页。

④ 《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条,第2283页。

⑤ 《徐兆玮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条,第2248页。

⑥ 参《王清穆辞太湖水利督办电》,《申报》1922年1月23日第15版;《请留太湖水利督办电》,《申报》1922年2月7日第11版;《王督办续电辞职》,《申报》1922年2月7日第11版;《王督办辞意打消》,《申报》1922年2月22日第10版。

⑦ 《申报》1922年3月14日第10版。

⑧ 《徐兆玮日记》,“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条,第2318页。

⑨ 《申报》,1922年3月14日第10版。

为会办^①。随着人事格局的更换,此后会办彭谷孙更多时候代表太湖水利局回应外界舆论,也似乎意味着金松岑在局中地位的动摇。

与此同时,有关放垦湖田的计划不仅在民间广为传播,更在报刊上也公开爆出,并言“太湖修浚,今亦千夫丛责。”^②对此,太湖局专门去电辟谣,“查本局职掌治湖,力谋去淤禁垦,并禁放种茭芦,迭咨两省行县,外间谰言诬蔑,又经刊送宣言,安有私利围田,致烦千夫丛责。”^③不过,有意思的是,仅在数月之后,江苏省财政厅即派沈兆九来苏州“设立清理湖田局,前往查勘,按亩升科”,公开标卖湖田^④。至此,由官方主导的湖田放垦计划被公开化,同时也遭到江南大部分士绅的激烈反对。如沈维贤、褚辅成等江浙国会议员五十余人联名致函大总统与总理,要求将“太湖水利工程局撤销,责成苏浙省长妥议改组,以杜水患而恤民瘼”。其陈述理由不仅包括前面论及的专制独裁、靡费冗员等,更直言“太湖局开办之初,即有放垦涨滩之计划,由局员金天翻陈述于江浙水利会之审查会,而审查会拒之。盖湖身淤浅,利在开通,私占圩田,久悬厉禁。该局职在浚湖,而谋放垦,居心叵测,物论惊疑。乃近闻其咨报财部,竟以浚垦兼施之策,蒙请备案。此说果行,必将与湖争田,借官入己,潮流日狭,但浚中泓,猝遇秋霖,尽成泽国,害及民生者。”^⑤

此议案一出,江浙议员与士绅迅速分化为两个阵营,金蓉镜与胡雨人等地方士绅二十余人以及江苏省议员张葆培等十余人公开去电支持这一议案^⑥。而江苏省农会等团体与江苏省议员章崇治等议员、潘祖谦等士绅则公开表示太湖局根本不需要改组^⑦。至于太湖水利局的当事人,王清穆在内部开会时表示将上书辞职,“敬告苏浙父老及参众两院议会诸君子,崇明引退,请求预备公推继任之人。余既退,则不改组而改组矣。否则,无论如何,改组断不能节俭经费,改头换面真是自欺欺人耳。”^⑧不过,各方争论虽然激烈,但是改组乃至撤销太湖局的议案并未得到江浙两省长的批准,在江浙省署看来,要浚治太湖,还是必须先办测量,建议“仍由督会办主持全局,积极进行,以息物议。至该局地控两省,体制权责,职任綦重。王督办老成干练,贤劳卓著,彭莫两会办舆论推崇,实心任事,自应一致坚留,以慰两省士民观成之望。”^⑨虽然省里支持太湖局的理由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放垦湖田的计划必须要太湖局参与具体执行。此后,江浙士人与政府之间围绕湖田放垦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而处在争论中心的太湖水利局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对此,金松岑自己有过解释,“天翻对于放垦湖滩,向不主张,最近尚有事实可证。该会审查会上绝未有所陈述,至去年茶话会上,曾有会员提出讨论,与天翻无干。沈君系该会副会长,何得记忆错误,是非所在,合行辩正。”^⑩事实上,沈维贤确实搞错了。根据后来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的解释:

①《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2901号(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②《无锡钱基厚等代电》,《申报》1922年3月11日第7版。

③《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代电》,《申报》1922年3月18日第6版。

④《省委清理湖田》,《申报》1922年8月8日第10版。

⑤《致总统、总理改组太湖水利工程局函》,《申报》1922年9月8日第7版。

⑥《公民电请改组太湖局》,《申报》1922年9月18日第13版;《苏议员电请裁撤太湖水利局》,《申报》1922年9月29日第13版。

⑦《省团体不主撤太湖水利局》,《申报》1922年9月15日第13版;《请免予改组太湖水利局电》,《申报》1922年9月22日,第11版。

⑧王清穆:《农隐庐日记》,“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条,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⑨《苏浙长核覆改组太湖水利局》,《申报》1923年2月23日第11版。

⑩《金天翻来函》,《申报》1922年9月10日第11版。

卷查此案经过情形,韩前省长根据民国八年江苏水利协会浚垦兼施议决案,飭由财政厅官产处,江南水利局会拟分区渐进。先从吴县洞庭东山入手,办法呈复核定以收入十成之五,拨充太湖水利工程之用,并抄录简章,咨请财政部核复有案,早为群公所深悉。揆度当时规定主旨,何尝不知浚湖为先务之急。果有巨款,立时可集,将历来湖民占垦地段悉数铲除。或以农利所关,竟官买民田,而开浚之,岂不较数十年来空言禁垦者为直截了当,谅群公亦必引以为快。乃度支告匮,既难取给于公帑,又未便责供于民间,不得已为是权衡挹注之方,略定先后设施之序。^①

可知,首先提出浚垦兼施方案是在民国八年江苏水利协会上,由江苏省财政厅官产处与江南水利局负责。而且明确表示收入的十分之五上交,另外的一半则拨充太湖水利工程之用。既然如此,那各方矛头为何直指太湖水利局呢?金元宪在给其兄金松岑所写的《伯兄贞献先生行状》中有较为隐晦的表述:

便议方行,而无锡胡雨人先作书相驳难,嘉兴金蓉镜、松江沈维贤等群噪和之,湖州人士且唱先浚淞,以攻治淞说,议论益歧杂。又吴巨室某公以托所私昵不遂,怒,与京朝官合辞讽清穆去位,而别鸠赆谋围垦庞山湖田,用摈先生。清穆气馁,殊左右难为计。先生大言曰:“庞山湖田成,吴江以东水利尽壅废。同里镇当下游,首被其灾,吾不能坐视,誓必毁之。”议遂格。然自是诸议悉罢,清穆间与诸异己者交欢,稍稍疏先生,工讫不成。十六年春,国民军定江南,裁局并委员会,中枢或荐起先生以为江南水利局长。先生长议论,而拙于治干,所言农田水利,当时或见迂阔,而后无不验。峭直刻方为干戾时俗态,以是蹇困无所合,期岁以代去。先生去,而庞山湖围田议卒报可,持障水者且浸用事。^②

结合前述金松岑在《申报》上的辩白与这段行文中的叙述,我们发现在湖田放垦这一问题上,太湖水利局内部已然出现了分裂,并且有权势更大的群体介入。也说明了金松岑在太湖水利局失势之后,局中的主要方向已经从“浚淞”转向了“放垦”,而背后的支持者则既包括所谓的“吴巨室某公”,更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在湖田放垦的问题上,金松岑是持反对意见的。但是他并没有参与江浙士绅的声讨,而仅仅是表态自己的意见,毕竟太湖水利局是自己亲手创设的。吊诡的是,胡雨人则对湖田问题持赞成态度。在一封写给沈惟贤的信中说到,沈泽春希望他能写一篇反对湖田放垦的文稿,但是他因意见不同并未应命。在他看来,湖田之围垦与放卖是两码事,不能并为一谈。“放亦垦,不放亦垦。虽以严刑峻法禁之,万不能铲除已成之田,使之复返为湖也。即曰严禁,今后种淤,亦一纸空文已耳,实际上万万做不到也。今日所当齐心致力者,果如何始得以放卖之银尽作浚河之费是也。江浙同志不欲治湖则已,果欲治湖,则浚垦兼施之说,非太湖局之私言,实天下之公言也。”^③

关于庞山湖围田的来龙去脉,在一份《苏民再请禁止领垦湖荡》的呈文中有过细致叙述。民国二、三年间,吴县东洞庭山因沿湖淤涨,积成芦荡,曾经有居民以“垦荒兴农为词,呈请创办农业公司,缴价领垦”。不过,因遭批驳,此案未能实现,并且“呈奉韩省长在民政长任内,指令将此案始末,勒石湖滨,永远禁止围筑”。其后任吴江知事杨懋卿、孙锡祺,以及江苏省巡按使齐耀琳都遵令禁约。此后,“虽尚有朱姓等化名朦请,历经驳斥,未敢公然围筑,而势豪私垦私筑,仍不能免。”民国七年,孔昭晋等士绅函呈省长齐耀琳,使得私垦私筑得以控制。不料至民国十一年(1922)八月,江苏省财政厅官产处派沈兆九为清理洞庭山荡地专员,按地质肥瘠,酌拟价格,招令升科。在江浙士绅看来,此举乃“阳为裨益公

① 《苏陈对太湖放垦之解释》,《申报》1926年5月18日第9版。

② 金元宪:《伯兄贞献先生行状》,见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06-611页。

③ 胡雨人:《又致沈思齐先生书》,《太平导报》1926年第1卷第16期。收入《胡雨人水利文集》,线装书局,2014年,第220页。

帑,挹注浚费,实则推翻十年来之成案,阴遂奸民占垦之私,而势豪又得分攘其利”。此后即出现“高嘉言等先后请领横泾市黄墟一带芦荡二万亩之事”,而“其内幕极为复杂,省垣传闻,道路皆知”。同时,江苏省的意见,“奉省长令委官产处长曾朴、太湖水利工程局会办彭谷孙办其事,另设专局,先从洞庭东山开始办理,并闻是项荡地,约拟放垦至三十余万亩之多”。面对如此行径,江浙士绅不禁感慨,“省长为十年前令飭永禁之原长官,勒石文字,昭昭在人耳目。齐王两长,历来皆维持原案,而韩省长忽翻前案,竟下此放垦之令。且前案早经咨部备案,地形地势,均无变更,何以前后办法,绝对两歧,实非地方人民所敢闻知。”^①

当然,政府的支持主要还是出于筹款的角度考虑,因为放垦湖田不仅有巨大收入,同时还能解决太湖水利局的款项问题,一举两得。这一点,江苏省政府的表态说得很清楚:

郑省长当查此案,前经韩前省长核准,并经咨请财部复核定案。原定主旨,因太湖全部测量,需费甚巨。若必待全部测定浚垦界线,再办放垦,值此国库艰窘,何能另拨巨帑,是测费先无着落,测务从何进行。洞庭东山,在太湖中心,并非宜泄口门,对于将来湖流宜泄具体之规画,关系较轻,着手进行,尚无大碍。目下湖身积淤之处,虽经查禁,仍多被人私擅围筑,如欲尽数铲除,比较疏浚,费用倍蓰,非事实上所能办到,即工程上亦决无此办法。况此次放领,并非将现有湖身,准人价领填筑,仅就已经淤涨或已被私擅围筑之处,准予放垦,以收入领价十成之五解缴国库,十成之五拨充太湖工程费,用较之空言疏浚而款无着落,测务停顿永无实施之期,徒使占垦者不缴田价,不纳国课,而坐享其利,当大有问。总之如此办法,固为增进国家正当之收入,亦足以促成太湖水利工程之实施。且清理办法,先尽原垦之户报领,并非招集外来之人报领垦筑,披称影响治安,不免误会,已经明白指令遵照矣。^②

要之,在江苏省公署和江苏省财政厅官产处的介入和主导下,太湖水利局因自身特殊的地位被推到台前,负责具体的执行事务,而期间之纠葛都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这一复杂局面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下,地方割据严重,加上连年战事,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均处于拮据状态造成的。所以,虽然各地士绅反对激烈,但放垦湖田的计划依然不断得以推行,而太湖水利局自然也无撤销之虞。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为统一太湖水利,裁撤督办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及江南水利局、浙西水利议事会,成立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才结束了其七年的争议之路^③。

综上所述,通过各方史料的挖掘,对民国前期围绕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而展开的水利纷争进行解读,得以看到诸多复杂的面相。作为地方社会运行的重要一环,水利事业不仅是公益关怀展示的空间,同时也是地方权势进行利益争夺的重要平台。实际上,“历史上每次政府发动的水利兴复活动,都有发生水旱灾难的重要背景。见诸史料的,基本上皆为概括性的描述,原因与过程讲述极为简约,而每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活动背后的复杂情形,更加难以确知。”^④ 围绕民国前期太湖流域的水利纷争也正是如此。民国初年,恰逢政权更替、中枢政权未稳之时,地方权力格局面临一次新的洗牌,水利无疑成为众多力量角逐的重要场域。

从太湖水利局的成立及其运作可以看出,民国前期江南地方士绅在个人与地方利益的表达方面

(下转第 129 页)

① 《苏民再请禁止领垦湖荡》,《申报》1926年6月25日第10版;《申报》1926年6月26日第12版。

② 《苏省长维持太湖浚垦原案》,《申报》1925年9月18日第9版。

③ 《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7版。

④ 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